

延寿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延寿县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延寿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延寿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11月

廣
征
博
採

許
雪
書



目 录

回忆延寿县的福寿大戏院.....	孙加琪 (1)
痛苦的回忆.....	北泽辉子 (6)
抗日前线的少年连.....	<u>万凤山</u> 口述 (13)
加信老爷庙.....	王玉尽 (17)
延寿土地改革运动.....	<u>王玉卿</u> (23)
回忆我的父亲刘麟钟.....	刘德山 (23)
回忆初创时期的延寿县民主政府武装农场	郝恩荫 (48)
信义成烧锅.....	张一新 (58)
李龙琪在四区.....	郝恩荫 (64)
回忆伪满时期的教育生涯.....	孙加懿 (72)
延寿宗教概况.....	张一新 (82)

回忆延寿县的福寿大戏院

孙加琪

记得旧中国的时候，同宾县（延寿原名）城内有一所很有名气的大戏院，人们称它福寿大戏院。当时，我岁数不大，但却是一个戏迷，常去那里看戏。它的兴衰史，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民国18年（1929）5月间，马玉顺、宋庆和、翟翰廷等人，鉴于城内娱乐场所很少，居民茶余饭后，只能去为数不多的茶馆听听大鼓书或评词，而无其它消遣之处，就联名向县府申请合资筹建戏院，当即被批准。8月份，一座木质结构的大戏院在关帝庙前（今镇医院北、县评剧团南面的中间地带）落成。最初，戏院取名为同义茶园，以后改名为福寿大戏院。

戏院场内最南端是后台，供演员化妆和休息之用。后台前是舞台，台上两侧各有一个门，右边的门叫“出将”，演员从此出台，左边的叫“入相”，演员从此下台。舞台下是大约四百多个座位的观众坐席。坐席分为三等：紧靠舞台正面的为一等坐席，叫雅座，每排坐前设有木桌，供观众放茶具和糖果等用。一般是有钱人坐在这里；雅座后边是池座，属二等坐席；东西两侧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的坐席以每两排为一个“包厢”，可容纳七八个人，专供县里各衙门官员享用。县长和承审（相当于法院院长）的“包厢”在最前面。财务处、教育局、公安局、农会、商会、商团、稽查处，税

捐局、一区（相当于现在的延寿镇政府），统带部（驻军团部），以及各营部等衙门的“包厢”依次向后排列；楼下两边的坐席（被称为“啃槽帮”）和最后边的坐席为三等，一般老百姓只能坐在这里。

戏院内有小卖店，专卖瓜籽、糖果、糕点、茶水等。还有打“手巾把”的。打“手巾把”的人练就了较硬的功夫，如果楼上某“包厢”内有人要“手中把”，他就马上把手巾在热水中浸一下，拧一把后随手向“包厢”扔去，保证准确地落在用手巾人的手中。

戏票按座位的等级定价：一等座一元五角；二等座一元；三等座五角。

戏院以马玉顺、褚晏海、韩庆祥三人为班主组成一个专业戏班子，以演京剧为主，其次是河北梆子，有时也演评剧。如果外地来戏班子也在该戏院穿插演出。

这个戏班子“生、旦、净、丑”各行当比较齐全，其中“生”角中老生演员有李云峰，主要剧目有《四进士》（宋士杰）、《坐官》（杨延辉）、《借东风》、《空城计》（诸葛亮）、《赵氏孤儿》（程婴）等，有时也演“红净”戏。还有十八红，也是老生（三髯）演员，主要剧目有《清官册》（寇准）、《天门走雪》（曹福）、《杀子报》（官保老师）等；武生演员有李云鹏，主要剧目有《战冀州》（马超）、《天水关》（姜维）、《红鬃烈马》（薛平贵）等；还有褚晏海，主要剧目有《收徐达》（徐达）、《潞安州》（陆登）、《斩经堂》，也叫《吴汉杀妻》（吴汉）等；祁春华也为武生演员，主要剧目有《收关胜》（关胜）、《南

阳关》(伍云昭)等；武生演员张凤樵的主要剧目有《淤泥河》(薛红贵)、《盘肠大战》(罗通)等；短打武生演员有韩庆祥，主要剧目有《铁公鸡》(张家祥)、《翠屏山》(石秀)、《白马坡》(马童)等；还有筱月秋，也演猴子戏，主要剧目有《连环套》(黄天霸)、《四杰村》(路宏州)；年令最小的“六岁红”主演娃娃戏，演出剧目有《宝连灯》(沉香)、《哪咤闹海》等；小生演员有筱月银，主要剧目有《凤仪亭》(吕布)、《双锁山》(高君宝)等；还有郭玉明，主要剧目有《拾玉镯》、《西厢记》等。

“旦”角中青旦有胡菊芬，主要剧目有《铡美案》(秦香莲)、《六月雪》(窦娥)、《玉堂春》(苏三)、《天门走雪》(薛金莲)等；刀马旦有花宝兰，主要剧目有《天门阵》(穆桂英)、《木兰从军》(花木兰)、《扈家庄》(一丈青)、《打赞》(杨排风)等；花旦有素雅卿，也演青旦，主要剧目有《贫女泪》、《棒打薄情郎》(金玉奴)、《凤还巢》(程雪娥)等。花旦还有胡小芬，主要剧目有《小放牛》(村女)、《乌龙院》(阎婆惜)、《翠屏山》(潘巧云)；老旦有天明月，也演青旦，主要剧目有《三娘教子》(李三娘)、《五女哭坟》。

“净”角分花净，演花脸戏，有孙宝立，主要剧目有《二进宫》(徐彦昭)、《草桥关》(姚期)、《镇王龙》(单雄信)；还有郎少山，也演红净，主要剧目有《九江口》(张定边)、《牧虎关》(高旺)、《将相和》(廉颇)；黑净有童红奎(女)，主要剧目有《探阴山》(包公)、《御果园》(尉迟敬德)等。王喜奎，主要剧目有《芦花荡》

(张飞)、《闹江州》(李逵)等。

丑角主要演滑稽戏，也叫三花脸，有大福才，主要剧目有《拾黄金》、《开茶馆》(店小二)；还有王春廷，主要剧目有《钓金鱼》(张义)、《杀子报》(纳云和尚)等。

另外，戏班子还有专业评剧演员金玉霞、水玉珠等，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王少安赶船》、《花为媒》、《马寡妇开店》、《珍珠衫》、《十八扯》等。

戏班子还有一些配角演员，被称为“打小旗儿的”或“跑龙套的”，主要扮演兵卒和佣人。

正常情况下，戏院每天演出两场，午后和晚上各一场。每天开始演的头出戏都由老年或不出名的演员来演，属一般剧目，没什么看头儿。比较好的戏是从第二出开始，最好的戏基本都安排在最后一出儿，被称为“压轴子戏”，由名角或新角来演。

每逢节日或县里的官员们来院看戏时，头一出儿专演“跳加官”节目，开场时，出来一个身着朝服、头戴翅帽儿、脚蹬朝靴、面戴假脸的人，手持一“条幅”，上面写着“天官赐福”或“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鼓乐班子敲锣，他在台上随着锣的节奏跳，跳一圈儿下去后，才正式演出。

福寿大戏院演出的戏剧，大都很受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到了冬季，农民卖粮或逢年过节时，基本场场满员，座无虚席。大型京剧《贫女泪》的演出，更是赢得了观众的欢迎，那真是百看不厌，每至戏演到贫女诉苦时便出现高潮，台上是连哭带唱，声泪俱下。台下是摩拳擦掌，悲恨交加，整个

剧场唏嘘一片，很是动人。

在旧社会，当一名演员也很不容易，地位低，收入也微薄，常遭人们的白眼，被叫做什么“唱戏的”、“戏子”等，很不好听，当时的延寿也是这样。如果来一个新的戏班子或新演员，除戏院广贴海报宣传外，新戏班子的著名演员还必须亲赴各衙门或达官显贵府上，以及豪绅巨商家去拜访，以求得他们的支持。演出时，头一场很重要，无论唱、念、做、打等都应赢得观众的喝彩，观众如果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炮”就算打响了，可以在此演下去。如果第一炮没打响，那就要卷起行装另去他乡了。武生李云鹏，在福寿大戏院所有的武生角色中，唱、念、打，各方面都高于其他同行，只因来延寿后，未到各处去拜访，因此在演出时未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和捧场，演技虽然很高，但叫好和鼓掌的人并不多，时间不太长就被迫收拾行装走了。

福寿大戏院在当时确是兴盛一时，就连戏院所在的永乐街也为之繁华起来，什么食杂店、饭馆子、糖果铺、大烟馆、妓院，无所不有。外来耍猴的、拉“西洋片”的，也多在这里占场，真可谓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九·一八”事变后，这座大戏院落了个关门停业的下场，演员们都各奔他乡了。

痛苦的回 忆

——日本侵华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北泽辉子

我们中和开拓团的移民绝大部分是日本长野县人，大多出身于农民或小手工业者家庭，属于下层劳动人民。我家在日本时是开浆洗房的。我们来中和的时间是1940年5月15日。听母亲说，当时谁都不愿意来，特别是妇女，更不愿意来，只有个别忠君思想严重的男人，出于孝忠国家和天皇的目的，不顾孩子哭老婆叫，态度还比较积极，愿意到中国来。但是，移民的一切事情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政府指定谁，谁就必须服从。

当时我家一共6口人，父母和我们4个孩子。那年我5岁，姐姐算是最大的，才7岁。同我们一起来中和的还有我姨一家。和亲人们分别时，大家想到再也不能相见了，都抱头痛哭，难舍难分，妈妈将自己事先剪下的一络头发和一点指甲包起来留给亲人做为纪念。开船的时间到了，这是叫人最难受的时刻，整个码头哭声连成一片。船慢慢地住前开，房舍渐渐地住后退，随着这段距离的增大，每个人的心都要碎了。我们先坐船到朝鲜，从朝鲜改坐火车，来到了牡丹江，经过换车，到了亚布力，最后开拓团派去接站的一辆马车把我们接到了六号（现庆阳农场场部）。当天，先到开拓团的人拿出自己烧的酒招待我们，当时我爸爸喝得大

醉。

我家被安排到南五号，和其他移民一样分到两间草房，记得草房是连脊的，又黑又小，我们来时还没有修好。中国邻居就请我们全家同他们一起吃住，这是没有想到的事儿。因为日本人到中国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好心的中国人看到我们有困难还帮助我们，所以非常感激。我们来到这以后，主要任务是种地，红部（开拓团团部）还给每家发一杆枪，由团部（设在六号）统一组织成年男人们利用很少的时间搞军事训练。开始的一年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到大食堂。种地由号上的队长统一组织。来中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这里的气候、食宿条件等一切都感到不适应，不过因为我们是开拓团的成员受到的待遇是比较优厚的。当时中国人吃大米饭被视为经济犯，而我们则一日三餐吃个饱。

开拓团在中和种植旱田的主要品种有玉米、大豆，也种一些蔬菜。日本人种旱田的方法是在平板地上种，号上雇佣的中国人非常善良，教给我们当地种地的方法，可日本人不相信，认为是骗他们，说那样种浪费地。然后仍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方法种，一垅双株或多株，垅与垅之间的距离又很近。结果到秋天玉米杆很细，玉米棒儿也不大点儿，有的还不结棒儿，总共也打不出多少粮食。我们种地收来的粮食主要是喂牲口，人吃的大米都是开拓团拨给。后来我们也耕种水田，当地的朝鲜族人教我们种田方法，由于是漫撒籽，耕种方法不先进，所以收成也不太好。

第二年开始，我们的生产、生活都分到各家各户了，每

户分得一头牛或一匹马，四家划分为一个小组，四家家长轮班当组长。组长主要负责和红部取得联系，办理这四家的生产、生活所需的一切事务，传达上边的指示。

来中和后，我母亲又生了两个男孩，我也渐渐地长大了。时间一长，我们这些日本小孩儿同中国邻居家的小孩儿也都熟悉了，经常在一起玩儿。记得邻居姓王的大娘家有个小姑娘，和我一般大，她常带我到她家去玩儿。王大娘对人非常和谒，她经常给我一些吃的东西，如苞米面饼子等，因我在日本没见过苞米面饼子，所以觉得特别好吃。过去中国农村有个习惯，家家供灶王爷，当时我看灶王爷花花绿绿的，感到很新鲜，自己家又没有，我就在家里拿一些报纸或白纸同中国小孩儿去交换。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得自己是作为侵略者的一员来中国的，因此，在同中国小朋友相处时，也是真心实意的，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同中国人民友谊的种子。

昭和16年（1941）以后，前线打仗越来越紧，我们的生活也不如以前了，供应的大米不够吃，有时就掺些黄豆或大楂子，穿的也多是粗布，来一点好布不够分就抓阄儿。由于生活的艰苦和孩子的拖累，妈妈得了肺结核病，在红部医院治疗很长时间也没好，红部又不让到中国医院去治，最后终于死去了。光复之前，爸爸和开拓团中所有的成年男人都被调去当兵了。记得爸爸临走时给我们留下一个小布包，并告诉我们不要打开，等他战死外边以后再打开看，我们遵照父亲的嘱咐，把它珍藏起来。自那以后号上剩下的不是小的就是老的，年轻的只有妇女了。我家更不幸，只剩下6个不懂事的孩子，最小的弟弟才3岁。尚未成年的大姐不得不挑起

维持家庭生活这个沉重的担子，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我爸爸被征去当兵后，希望战败，这样好回家。虽然他没有战死，但遭了不少罪。日本战败以后，苏联军队把日本战俘都赶到了西伯利亚当劳工，在那里爸爸吃尽了苦头，后来又回到了日本。

光复前几天，从佳木斯那边又来了不少日本人，也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听说领头的是间岛省副省长（日本人）。记得光复那一天，我们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学校设在三号，有七八个日本教师，校长在光复时战死，教我的老师叫山奇文磨，中日关系恢复后，曾访问我县两次）。走着走着突然听到枪声，我们年龄小的还当新鲜事呢，可大一点儿的学生知道不是好事，说不好听了，胡子来了（实际是保安队）！就往家跑。我们也跟着往家跑，到家后，我姐姐领我们往苞米地里藏东西。后来，天上经常出现飞机，形势越来越紧。我们的上级来了命令，让屯子里挂白旗，三家归到一起等命令。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战败了。听说老毛子（苏联人）来了，年轻的姑娘、媳妇都跑到山上藏起来，剩下的就是老人和小孩儿了。从此，日本人就开始有自杀的了，从佳木斯来的那伙人还组织了一次集体自杀，听说有上百人。他们集中到六号的北山头处，把带来的东西和钱先烧掉，然后那个副省长用枪把他们全部打死，后来人们把那个地方叫“肉丘坟”。七号还有个日本人，被征去当兵刚走到哈尔滨就光复了，他跑回来把媳妇和孩子枪杀之后把房子也烧了。

这时，抢号的事陆续在各号出现了，他们大多是附近的

穷苦老百姓，有南边蚂蚁河的，最远的还有北边加信子的。我们吓得藏没处藏，躲没处躲，哭也不敢大声。年岁大的边流泪边说：完了，国也回不去了，在这又受罪，这是报应啊！谁让我们到中国来了？大家恨日本当官的和日本政府。最后我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其它一切东西都被抢光了，爸爸留给我们的的小布包也在这场动乱中丢失了。我们住的房子多数被拆的拆、烧的烧。

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号上来了一些苏联军人，组织我们往方正去，个别有病的和年纪太大的坐在马车上，其余的人都步行。我大姐背着最小的弟弟，剩我们几个就手拉着手跟着走。第一天晚上是在加信小学住的，那里既没有炕，也没有床，我们穿的又不多，前半夜还好过，到后半夜把我们冻得直哆嗦。这天晚上，有的年令大一点儿的漂亮姑娘被苏联人奸污了。第二天又接着走，过亮珠河时，有个身体不好的老太太连饿带累，遭不起罪，就投河死了。过河后，到了一个朝鲜屯，又有些苏联人开始搜我们的身，主要是找手表。

到方正后，我们住在原来方正开拓团红部，条件也不好，少数人睡在板床上，多数人只能在水泥地铺上稻草睡，连床被子也没有。吃饭开始是由苏联人统一发，每顿一人一小碗，后来给我们每家两个铁帽子，发给皮粮自己碾米，然后用铁帽子做饭吃。有时吃不饱就到城外地里拣瓜、菜充饥，甚至跑到人家苞米地里偷掰青苞米吃，让人家看见还得挨打。一些中国人看到我们这些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挺可怜的，就想收养，有不少孩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给人了。那时候如果把我的小小弟弟送人也好，可是姐姐说谁也不给，

死就都死在一起。后来，由于吃不饱，天气又冷，老人和太小的孩子死了不少，也有得伤寒病而死的，我最小的弟弟就是那时死在了方正。

过了1946年元旦，苏联人都撤走了，方正当地政府就组织我们各回各开拓团原地。我们中和来的，先派人回去联系妥之后，又都回到了中和。号上的房子基本没有了，大家无处可去，纷纷投靠了原来在我们各家当雇工的中国人，这样一家人也就有了着落。有的青年妇女嫁给了原来自己家的雇工，现在中和镇街里的岳元珍和中和胜利村的赵方，就是娶的自己曾给干过活的日本人家的媳妇。当时，大多数家的妇女嫁给了比较穷的或有病的中国男人，无着落的孩子有的被卖，有的当了童养媳，我姨也嫁给了一个中国人，我们姐弟5人开始就在他家生活。时间不长，因姨父家穷，无法养活我们这些人，姐姐嫁到了老柴家，3个弟弟送了人。我开始以二百元苏联红票的价钱卖到地主老朱家。因为我听不懂中国话，不会干活，身体小，背不动孩子，所以经常挨打受骂。我实在受不了，一天，偷偷跑回了姨家，开始我姨不敢留我，怕人家来找，后来她看我一个劲儿地哭，就把我藏到炕上一个柜旮旯里，用被子蒙上了。不一会儿，老朱家真的亲人了，我姨一口咬定说没回来，但是来找的人发现了我那双放在地上的鞋，结果我没能逃出人家的手心，又被拉回到了老朱家。打这以后，我被看得更严，打得也更重了。痛苦的折磨，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没过几天，我第二次从老朱家跑了出来。这次老朱家也不打算要我了，就让我姨家退钱，没办法，我只好去给人家放猪挣钱还这赎身债。

我13岁那年，被团圆给中和大粮户老信家，换了些柴和米。“七·七”砍挖斗争时，老信家被斗，家产被分，农会为照顾我这个日本孩子，给我留下了一床被。这时家里只剩下一床被了，我能盖着吗？棉被给大人盖，我盖的是五道径的草帘子。因为房子漏，窗子连张纸也没有，呼呼的风一个劲儿地往屋里灌，冻得我得了场大病。这一次又是农会救了我，经农会做主，我回到了姨家。这时，姨家经过“七·七”砍挖，分到了土地和一些财产，生活也好多了，我的病很快也就好了。

15岁那年，我正式嫁给了徐庆忠。在政府的关怀下，我开始过上了安稳的日子，生活一天比一天好。50年代我们和日本的亲属取得了联系，也找到了分别多年的父亲，三个弟弟都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我和姐姐都有了丈夫和孩子，生活也挺好，所以一直在中国生活到现在。

孟宪义 党玉清整理

抗日前线的少年连

万凤山口述

1934年我19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当时，由于日寇的入侵和地主老财的残酷剥削，我们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痛苦生活。再加上日伪军和汉奸横行霸道，我感到这世道实在是让人无法活了。恰好这时我听说三股流一带出了抗日队伍，领头的叫赵尚志，专门和日寇、汉奸作对，为穷苦人谋福利，我就决心去投奔赵尚志，参加抗日的队伍。可我又想：就这么去，人家能要我吗？于是我找了给抗日队伍上当交通员的沙永振同志。他一听说很高兴，真就把我们几个送到三股流，加入了张连科领导的第三队。

我记得当时发给我一根木棒，就算入伍了。接着又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有一天，中队长领来一个人，这人个头不高，脸色黑里透红，两只眼睛特别明亮，仔细一看，一只眼下还有一条伤疤。这时附近有人插了我一下说：“这就是赵队长！”后来我们大家都叫他赵司令。

啊！他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赵尚志！他开始讲话了，声音非常洪亮。我至今还记得有这么几句：“我们是抗日的，不是胡子（土匪），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要有纪律，要听指挥，打仗要勇敢！”

不久，我们被编入作战部队，但也没有发枪，只给颗手榴弹。我一看，同志们武器也很简单，大多是扎枪、洋炮，比